

论“中国和平崛起论”中的 “实践唯物主义”发展模式

朴柄久*

摘要：为了应对西方世界提出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论”。因为中国“和平崛起”已经具体化和明朗化，所以“中国和平崛起论”应该系统化、理论化。“中国和平崛起论”是在当前全体中国人民追求变化的能力和传统社会不同质的情况下，在社会层面上修正社会结构，在政治层面上扩大大众政治参与的基础上，提高领导层与大众之间的认同。“中国和平崛起论”具有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实践唯物主义意味着实现自我认同、主体意识和自主发展。因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提是内部统一的政治秩序，所以没有自我认同，中国“和平崛起”就不可能成功，没有整个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也不能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崛起”是当前中国的战略性目标，而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是：国内政治体制的稳定；人民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合乎国家力量的国际社会责任和贡献。

关键词：和平崛起 实践唯物主义 世界体系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 朴柄久，韩国学者，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客座教师，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思想、东亚国际关系。

一 问题的提出

国际政治由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政治主题等构成,涉及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以及合作、对立与冲突的辩证过程。^①当前国际政治舞台上“崛起”中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就是中国。国际政治秩序以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客观实力为基础,通过对外战略和政策的相互合作,经过各种势力的稳定配合而发展。在国际政治的辩证过程中,权力主体会发生变化,权力主体为了巩固对外支配地位会形成新的思想、规则、机制。“中国和平崛起论”坚持国际政治新秩序,反对以往大国的霸权政治。国际政治主题是国际社会主要矛盾的反映,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和目前正在解决的主要课题,并且国际政治主题会随着国际体系的演变而变化。如东亚朝贡宗藩体系的主题就是“名分”和“实利”;凡尔赛体系的主题是帝国主义“战争”和共产主义“革命”;雅尔塔体系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目前新的国际政治主题正在形成中。笔者认为,21世纪国际政治主题是“网络外交”和“可持续发展”。例如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部网站积极活用微博、社会网络等进行国际交往,这种方式就是一种“网络外交”。美国小布什政府的“2025年外交部最终报告书(2008)”强调了21世纪中期的外交主角和舞台不仅是像过去那样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军事和经济竞争、对抗,而且应包容国内外多样性主角的出现和爆发性的科学技术舞台。^②人类面临着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恐怖事件等。可持续发展也是和中国的新安全观一致的,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全世界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新兴经济大国的中国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威胁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悄然出现,并长期存在于西方世界。1992年以前的“中国威胁论”是一种黄祸论,即中国的经济崩溃会导致大量的难民,对日本等周边国家造成不利的影 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日本、美国和欧洲又提出了新的“中国威胁论”,即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储备大量的外国货币后走向军

^① 参见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5页。

^② 河英善:《2025外交革命》,2009年11月9日《朝鲜日报》。

事大国会带来威胁。1992年后“中国威胁论”的提出是因为中国崛起令西方产生恐惧感，相应的2003年后中国提出了备受国内外瞩目的“中国和平崛起论”。“中国和平崛起论”是由邓小平构想、江泽民积极推动、胡锦涛具体落实而逐步形成的。尽管现实主义者认为，邓小平提出的“有所作为”是中国政府应该落实的战略，但是中国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内部和谐，推动外部和平。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崛起中的大国自己宣布要“和平崛起”，但是中国却主动向世界宣布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和平崛起论”是中国在面对“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时，以对外和平、对内和谐为宗旨而采取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中国和平崛起论”登台的原因有二：其一，中国国内应解决的问题还有许多；其二，“中国和平崛起”已经具体化、可视化了。所以“中国和平崛起论”应该系统化、理论化。为了应对西方世界提出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论”。为了主导国际社会，世界各国要树立自己的规范、思想、规则，而中国也需要树立“和平崛起论”的形成路径、理论基础及文化架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中国和平崛起论”根源性的思想来源。为了分析“中国和平崛起论”中的“实践唯物主义”发展模式，笔者提出了三个问题。首先，世界体系的演变和“中国和平崛起论”有何相关性？其次，马克思主义的演变和“中国和平崛起论”有何相关性？“中国和平崛起”为何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其发展模式？再次，“中国和平崛起论”中的实践唯物主义发展模式是什么？笔者将依据“实践唯物主义”来回答以上问题。

二 世界体系的演变与“中国和平崛起论”的登台

（一）世界体系的含义

沃勒斯坦认为中心国家—边缘国家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大部分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利益而引发的，而世界体系是一个实体，既有劳动分工又有多元文化。他认为世界体系的特点如下：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建立的；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通过周期方式运行；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在不断的资本积累基础上建立的体系；四、资本主义世

界体系是要求运动和变化的体系；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极化（Polarization）的体系；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历史的体系。沃勒斯坦认为，因为世界体系的各个部分由经济连接，所以世界体系的最基本特点就是经济上的体系。^① 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实力基础上进行了资本输出，从经济上、领土上分割世界，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②

（二）崛起的含义

“崛起”是一个复合过程，内容不是单一元素，而是包含多个元素。其一，“发展”与“崛起”是不一样的概念。“发展”是向优良方向的进步，而“崛起”并不一定是走向优良方向。大国崛起有可能造成负面的影响，比如走向霸权崛起的道路。“崛起”是跟国家经济发展不一样的概念，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广泛的范围内进行的。“崛起”不仅注重经济利益，而且也注重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间的均衡。其二，“崛起”是一个相对性概念，是为了缩小跟其他国家的差距，以一个竞争对手力量下降为前提的相对性概念。“崛起”是国际地位不断上升，逐渐接近最强大国家的过程。其三，“崛起”的目的是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崛起国家不愿受到霸权国的支配，它以主导地位的先占和国际影响力的行使为前提。“崛起”过程还常常与民族主义紧密联结。其四，“崛起”本身是零和（zero-sum）博弈。“崛起”是在国际社会上作用的上升，影响力的增大，跟世界主导国共享世界事务的领导权。^③

（三）世界体系的演变与“中国”的关系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随着15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诞生逐渐形成。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资本家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以及占领殖民地，通过国际分工形成世界市场。由于资本具有不断扩散的特点，欧洲资本主义为了寻求廉价的生产要素而转移到亚非，亚非逐渐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随着国际经济交流的扩大，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基础便形成了。新航路开辟后

^①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4 - 15.

^② 梁守德、洪银娟：《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08～109页。

^③ 参见阎学通、孙学峰等《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页。

各国家的往来变得密切，不论是频繁战争还是合纵连横，其目的都是为了增强自身国力，打击弱小国家，维护自身利益。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仅是合作与利用的关系，全球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沃勒斯坦指出，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现代世界体系产生于欧洲一隅，“它有异于帝国、城邦和国家，因为它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经济实体。事实上，它的范围囊括了帝国、城邦和正在出现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世界’体系，并非由于它囊括了整个世界，而是由于它大于任何从法律上定义的政治单位。它还是一个‘世界经济体’，因为这个体系各个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①

唐宋时期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明朝开始逐步衰落。明清两朝为了维持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而固守封闭政策。而18世纪后期，英国等西欧国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增长提供了世界体系形成的物质条件。17~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开始发展工业。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扩散到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地区与国家，为了巩固统治、掠夺土地，需要进行强制性国际分工。1870年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垄断资本主义控制国家经济和政权，资本主义国家沦为垄断资本家利益的辩护者。

鸦片战争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海洋势力登场后和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海洋势力侵入中国后与中国缔结了不平等条约。当时处于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状态的清朝在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前，除了广州之外并不开放港口，并且不鼓励海外贸易和交易。清朝不太看重外部世界的变化，解决中国内部问题是王朝的关键任务。东亚朝贡体系是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模式，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跨洲、跨界的体系。结果，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世界体系演变的“客体”。东亚朝贡关系体系的“名分”和“实利”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客观性实力面前瓦解了，东亚被迫融入更强力 and 更广泛的世界体系。

“世界体系”的变化过程是一个因素变化为另一个因素的过程，具有相互依存性；是全世界范围的过程；是长时间的、进步的过程。关于世界体系的转换，从中国的空间范围来讲，19世纪以前，中国中原地区是中国和东亚的核心地区。当时东亚体系中的商业区域大部分集中在长安、洛阳、开

^①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第12页。

封、北京等内陆城市。明朝以来沿海地区发展起来，但满族进入中原后沿海地区的发展被遏制。到19世纪日本崛起之前，东亚国际体系的政治、文明中心还是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①

1945年后，韩国、日本、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它们利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贸易（GATT）、金融（IMF，IBRD）、货币机制进行国际贸易。而面对资本流动的国际化，中国的任务主要在于怎么利用国际经济体系迅速发展经济。冷战时期，中国一直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而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却积累了资本和技术。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机制都是先进发达国家提倡的，中国为了实现经济利益应主动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利用资本流动的国际化，改造世界经济体系。^②

改革开放是“中国崛起”最重要的分水岭。中国要摆脱冷战思维，搁置、摒弃矛盾与对立，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发展。1979年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从广东省率先展开。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香港和澳门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窗口。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主动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出发点。珠江三角洲的市场经济是由外部市场主导的，其生产主体有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珠江三角洲还利用毗邻香港、澳门的地理优势，采取外向型的发展模式，接受了从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日本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引入外资尤其是香港、澳门的资金，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中国三大经济中心即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产业结构向亚太转移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人类历史上的大国崛起都是在强大的物质和制造业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物质供应国，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金融市场是在制造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前中国的美元储备量世界第一，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发言权越来越大，并意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拥有更重的分量。由于英美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而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又容易造成世界性通货膨胀，所以中国意图改革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试图使人民币国际化。为了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就需要货币的“稳定性”，而人民币的“稳定性”取决于中国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①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第326页。

②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第349页。

三 马克思主义的演变和“中国和平崛起论”

近代唯心主义固执于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先验自我”和“绝对理念”，对主体性作了先验性的概括；近代旧唯物主义则坚持对脱离历史的、“本真”的“内在自然”作感性的直观，对主体性作了直观性的描述。^① 马克思哲学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以“现实的个人”代替了思辨中的“理念人”，以“现实生活的世界”代替了思辨中的“存在背后的存在”世界，以人的感性活动代替了抽象的精神活动，提出了改变世界的口号，实现了以“拒斥形而上学，回归生活世界”为特征的现代哲学的转折。^② 马克思主义是从现实的人出发的，“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③ 确立现实的人为自己学说的出发点，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前人思想的各种出发点进行批判的结果，是人类思想发展史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④

实践观是实践唯物主义思潮论争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实践唯物主义思潮理论的成长点，实践唯物主义思潮总的来说缘起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演进，一切具体的论争都是从实践观问题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1978年发生是必然的，它也必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复兴的起点，成为实践唯物主义思潮发展的起点，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功能决定的。^⑤ 实践是人作为世界主体的真正意义，人通过实践认识自然，使自然成为“人化自然”，人通过实践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使社会成为“人文社会”。^⑥ 这是人类哲学史上的“认识论转向”与“实践论转向”的重大转折以及哲学主题，从研究对象与本质属性来讲，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本质的确切表述。^⑦

从唯物主义的发展历史看，古代唯物主义作为朴素唯物主义是一种自然

① 刘金萍：《主体形而上学批判与马克思哲学“主体性”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85页。

② 刘金萍：《主体形而上学批判与马克思哲学“主体性”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10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30页。

④ 赵海英：《主体性：与历史同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53页。

⑤ 孙芳：《中国实践唯物主义思潮流变》，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第9~10页。

⑥ 黄锦奎：《新体系哲学与创造性实践唯物主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40页。

⑦ 黄锦奎：《新体系哲学与创造性实践唯物主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42页。

唯物主义，它把世界理解为意识与自然的“二维”结构，反对把一切归于精神、归于灵魂的唯心主义，把世界看成一个自在存在的自然物质系统，人是自然物质系统的一种表现形态。^① 马克思独树一帜地阐述了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对传统的唯物主义物质观进行全面革新与充实，因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物质观的根本缺陷。^②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③ 直观唯物主义没有从主体的实践去理解与观察世界，从而具有不彻底性，是一种不彻底的唯物主义。^④ 实践唯物主义从主体、功能的、动态的过程来理解唯物主义，把“存在”理解为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过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这种“物质变换”过程中，人类所能做到的是“改变物质形态”，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正是人类认识改造自然、人类社会以及整个人类世界的基础，这也是实践唯物主义根植于“唯物”的本质的现代表现形态。^⑤ 传统唯心主义哲学在本质主义、现成性的思维方式下，企图一劳永逸地“解释世界”、希求绝对真理的愿望是不切实际的。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领域上发生根本性变化、实践唯物主义政治思想开始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哲学主题从“解释世界”转变为“改变世界”，标志着马克思对世界的理解已由传统哲学本质主义的、与人无涉的、现成的世界观，转变成历史性的、处于人的现实生活中的、生成的世界观。^⑥

每一种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巨大影响，同样，激烈的国际政治权力斗争的历史中，“中国和平崛起论”的形成受到国内、国际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从国内形势来看，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强调必然性、规律性和因果决定论的绝对性，而不太谈人的主体性、人的个性、人的自由和人的权利，甚至践踏人的正常权利，谈“人”变色，把“人”的问题看做资产阶级的专利而加以批判。其结果是，抑制了广大人民群众

① 黄锦奎：《新体系哲学与创造性实践唯物主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43页。

② 黄锦奎：《新体系哲学与创造性实践唯物主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4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4页。

④ 黄锦奎：《新体系哲学与创造性实践唯物主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45页。

⑤ 黄锦奎：《新体系哲学与创造性实践唯物主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48页。

⑥ 赵海英：《主体性：与历史同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57-58页。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① 实践唯物主义思潮的生发与兴起是改革环境的产物，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是改革这一不可逆转的总方向和总趋势导引的必然结论。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律指令、统一安排和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依赖盲从以及等级特权的方式、观念和作风必然受到根本冲击。与此相反，开拓创新的主体精神、独立、主动、自主的个性与人格以及平等、自由、自我奋斗和自我实现的主体意识必然得以凸显。因此，以弘扬主体性为主旨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潮应时而生了。^②

中国的对内政策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迁。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为主的，即阶级利益是超国家利益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生产关系主要是国家与工人的关系，生产力依靠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原有的经济秩序被打破，实用主义支配中国对内政策，国家利益超越了阶级利益。在改革开放时期就中国政治内部的变化来说，中国为了能够抓住机会，积极开展各项改革。这一时期也是国有制度逐步瓦解，中国特色私有经营制度逐渐形成的时期。市场化改革以来，旧的以国有制为中心的生产关系成了束缚新的生产力的枷锁，这样的环境对改革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是要推行改革，求得长远的安定，还是实行旧的国家管理制度？“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动荡，人心不安，人民困苦的生活，使得改革派迫切希望天下的安定与统一，于是，新兴的改革派摆脱了旧时代的管理体系。随着改革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的演变，中国主动去适应、改变自己，开始推行实践唯物主义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是巩固中国自身力量的最关键因素。换言之，中国必须尽力发展经济以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真正目的。

从国际形势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赖以维持国际秩序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崩溃，整个国际社会陷入所谓的“全球化”竞争局面。推行改革开放时中国一直关注外部的变化，为了不在激烈的国际政治权力斗争中被淘汰出局，中国纷纷与其他国家形成了合作与竞争的格局，而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全球化时期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改革，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增强国力和增加百姓的民生福利。中国力图建立国际政治新

① 韩庆祥：《思想是时代的声音：从哲学到入学》，新世界出版社，2005，第218页。

② 孙芳：《中国实践唯物主义思潮流变》，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第2-3页。

秩序，让人民安居乐业，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和平崛起论”。由于改革面临着许多挑战，若改革成功，便一跃成为大国；改革失败，就会失去与大国抗衡的能力。而中国改革的目的是无外乎是通过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扩大大国政治的影响力。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国际社会发生的政治现象实际上是世界体系变化的体现。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体系的非政治因素是文化、经济、地理、社会等。政治和非政治因素共同作用于“和平与发展”时期，并在政治现象的改变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政治改革，也为“崛起”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些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旧的制度，增强了国力，提高了生产率。

四 国际政治新秩序和“中国和平崛起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都属于国际政治旧秩序，都是经过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后出现的国际秩序。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新兴大国德国和日本通过帝国主义战争扩大世界市场，而且力图改变以往的国际政治秩序，这都属于国际政治旧秩序。国际政治旧秩序可以说是只顾及胜利者的利益、由战胜国主导的秩序。

1991年雅尔塔体系瓦解之后，国家的对内外政策中经济成了关键因素。经济相互依存是国家间强化合作和形成地区经济共同体的基础，历史潮流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国际政治新秩序尊重各国的文明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中共在十五大、十六大上提出了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具体内容。中共十五大决定了10个对外政策，其内容如下：坚持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始终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尊重世界多样性；坚持睦邻友好关系；强化跟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跟发达国家的关系，中国推进“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和任何大国不结盟；坚持互惠平等原则，扩大跟世界各国、地区的广泛的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积极参与多极外交，在联合国等其他国际组织中积极发挥作用；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基础上跟中国共产党交流的各国新的党际交流，发展合作关系。中共十六大报告强调“国际政治和平”、“经济发展”，强调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四个

方面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十六大提出，政治上，互相尊重、共同协商、不要强迫自己的意志给他人；经济上，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互相学习、共同繁荣、不要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推进互相信赖、互惠平等、协助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合作解决分歧，不要呼吁武力。^①

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表面意图并不是像过去那样要恢复宗藩关系、华夷秩序。中国要“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搞霸权主义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而是要在国际社会上担负和作出符合国家力量的责任和贡献。国际政治新秩序强调世界走向多极化，中国一定要顺应历史潮流。“中国和平崛起论”不是一种模糊性战略，即不是为了避免美国等大国的牵制、阻挠而故作谦虚，而是按照中国自己的国情、现实制定的对外政策。

五 “中国和平崛起论”中的“实践唯物主义”发展模式

（一）自我认同

从历史上来看，“自我认同”与“崛起”的现象有密切的关系。西欧、日本等的“崛起”过程与“自我认同”是在密切的关系中展开的。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由于不同国家的特殊性，在相异的情况下结合、展开。就是说，不能把两者间的关系一般化。对中国而言，在清末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和国家面临危机时产生了“自我认同”，而这种“自我认同”和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国人对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反抗，其抵抗是在从民众到官僚阶层等多样的势力中展开的，中华民族通过彻底的抵抗形成了“自我认同”。

马克思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

^①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暨《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学习十六大报告学术研讨会综述》，《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1期。

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 这即是说，人不是历史活动的工具，人是自己历史的“自性”、“自信”、“自足”和“自在自为”的规定者，“人的历史”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历史，就是人的主体性现实化的过程。^② “中国和平崛起论”是在当前全体中国人民追求变化和传统社会不同质的情况下，在社会层面上改革社会结构，在政治层面上扩大大众参与的基础上，领导层与大众之间的认同。实践唯物主义意味着实现自我认同，自觉主体意识，试图自主发展，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人、理解人的存在。人是“实践的人”，由于实践是自由的、自觉的、能动的，因此人也就是具体的、能动的、拥有现实的主体性的人。自觉的主体性是人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是在观念中对自己的现实的主体身份的确认。^③ “和平崛起”与“自我认同”之间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中国“和平崛起”中的实践唯物主义是通过自我认同、能动性来摆脱依附性。“实践的人”能够自觉地按照自己的需要，在遵循外部对象的客观尺度的前提下，把自身的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来设定活动的目的，并努力在对象性活动中实现自我认同。^④ 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提是内部统一的政治秩序，所以没有“自我认同”，中国的“和平崛起”就不可能成功，没有整个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就不能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二）主体性

人类历史是个人的主体性提升的历史。实践唯物主义不是抽象地看“人”，而是具体地看“人”，其中主要看“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

从“主体”方面分析中国“和平崛起”，主要是看中国“靠谁发展”。在这方面，关键是对待历史的创造者——中国人民的态度问题。具体表现在，是尊重还是忽视中国人民的主体地位，是发挥还是压制中国人民的首创精神。“促进中国人民的全面发展”，强调尊重中国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中国人民首创精神，这是基于中国国情的考察，或者说由中国的国家制度所决定的。^⑤ 中国已经不是世界政治经济的“客体”，而是世界历史潮流的“主体”。

从“客体”方面分析中国和平崛起，主要是看中国“为谁发展”以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118～119页。

② 赵海英：《主体性：与历史同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87页。

③ 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64页。

④ 赵海英：《主体性：与历史同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83页。

⑤ 常修译：《人本体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第13页。

相应的“发展成果如何分配”的问题。在这方面，究竟是“为最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还是“为部分人的利益”？改革发展成果由“部分人”分享，还是由“全体人民”共享？这是问题的症结。^①

中国“和平崛起”中的实践唯物主义注重中国的“主体性”发展。“中国和平崛起论”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在对国际关系的作用过程中所表现的中国主体性水平的全面提高，也就是中国的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全面发展。中国“和平崛起”的主体是中国人民自己，即“中国自己的命运由中国人民自己主宰，自身的命运由自己改变”，并且把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和平崛起”理想。摆脱大国崛起的诱惑，按照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实行自主政策就是“和平崛起”。每个国家都要按情况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也是中国“和平崛起”追求的方法。实践唯物主义强调通过人们的实践改造现状、改造人们自身而发展，显出人们的“主体性”。“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② 实践唯物主义强调的主体性是：自由和解放；个人的全面发展；自发性。“中国和平崛起”发挥能动性的前提是主体的自主性。

（三）全面发展

“促进中国人民的全面发展”是符合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它与抽象谈论“人”的历史唯心论有原则区别。实践唯物主义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将它作为现代发展体系的核心，是与人类现代发展理念内在相通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禁锢，在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金钱侵蚀，从而导致人的主体性的“僵化”。中国正在探索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的经济体制，其基本价值趋向是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法治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结合。在人的开放性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其活动是面向社会又依赖于社会的，它使“人”得以开放自己的人生，释放自己的心灵，弘扬自己的个性，把握自己的命运。^③

① 常修译：《人本体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第14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2，第19页。

③ 常修译：《人本体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第10~12页。

实践唯物主义内容大体包括：人的第一次解放；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生存、发展和享乐需要；人的物质利益及其构成；人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人的价值的实现；人与生产资料的最佳结合；人的素质要素及其提高；人的积极性的发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①

中国“和平崛起”中的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中国的全面发展、感召力的实现、独立性的追求。中国人民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中国和平崛起论”的任务。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是人的平等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人”是指每个人。“全面发展”，就是指每个人都能得到的“人”的平等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和“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的平等发展，是指每个人都应得到平等的发展，是人作为“类”所应有的发展。这是“人”的全面发展。^② 实践唯物主义从人类本质和个人感性存在的分离出发说明个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在实践唯物主义看来，个人解放和全面发展是个人自由的前提。“中国和平崛起论”强调的全面发展，是所有中国人的平等发展和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自由的消极意思是从精神上的压迫、物质上的贫困中解放出来，解决人们的现实生存问题是人本主义的实践。“中国和平崛起论”中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由不仅是人们从精神压迫和物质贫困中的解放，而且是要解决人们的现实生活问题。

“全面发展”跟中国现代化也有相关性。为了“全面发展”中国首先需要物质方面工业化，精神方面理性化。首先，物质方面，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需求量越来越增大。为了推动可持续发展，中国应该全面发展新能源。其次，精神方面，中国和平崛起强调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协调。为了和平崛起，中国应该避免像1950年“大跃进”运动、1960~19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冒险和政治动荡。^③ “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动荡为改革派“中国和平崛起论”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当然，在现实中，不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注重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事情是存在的，有的地方还十分严重，唯此，才讲人的主体性问题。但从基本上说，“靠谁发展”的主体是明确的。^④ 再次，构

① 常修译：《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第35页。

② 韩庆祥：《思想是时代的声音：从哲学到入学》，新世界出版社，2005，第188页。

③ 参见阎学通、孙学峰等《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9页。

④ 常修译：《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第13页。

建“网络外交”(Network Diplomacy)。目前世界不仅是国际关系,城市与城市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了。“网络外交”是在空间上超越领土观念,活用数码技术,外交舞台从“国际”扩大到“人民际”。^①

六 结论

对于以上关于“中国和平崛起论”的“实践唯物主义”发展模式,笔者作出以下结论。作为国际政治的主角之一,中国依据和平方式改造世界,是“中国和平崛起论”的“实践唯物主义”发展模式。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中国和平崛起论”中的“实践唯物主义”发展模式以两个方面为基础:其一,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实际情况远不一致。“中国和平崛起论”的“实践唯物主义”发展模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的互相统一,是中国“和平崛起”哲学最基本的原则。其二,中国选择“和平崛起”就是王道。王道国家支配世界,国际秩序就会稳定。相反,霸权国家支配世界,世界就会不稳定。王道以道德和规范指导世界,霸道以硬实力即武力支配世界。中国比强权更注重说服。仁、道德力量和说服力是中国的软实力。“中国和平崛起论”强调“中国尽力实行道德义务”。“中国和平崛起论”是当前中国的战略性目标。王道政治是中国内外政策的标准,即王道政治是中国内外政策的规范性的“中国式标准”(China Standard)。“中国和平崛起论”不仅是“内生的崛起”,而且是“外生的崛起”。要实现“内生的崛起”,中国需要国内政治体制的稳定、人民基本生活的保障。要实现“外生的崛起”,中国的主权合法性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和尊重,并有合乎国家力量的国际社会责任和贡献。

历史也证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造成了不幸的结果。因此,大国在历史面前应该谦虚,中国也不例外。拥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崛起绝不会成功,其“大国崛起”是通过战争实现,国力的增长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和牵制。就目前的国际形势而言,霸权秩序难以决定国际秩序。“中国和平崛起论”不仅是中国自己的防御机制,而且是大国崛起的“中国式改编”。所有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如美国有“华盛顿共识”

^① 河英善:《2025 外交革命》,2009年11月9日《朝鲜日报》。

(Washington Consensus)，而中国也有“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有人提出“北京共识”有可能造成“中国威胁论”。但是，如果中国没有主体的发展模式，则很可能失去发展方向，走向迷途。按照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走向未来，是中国自己的任务和责任。为了把握这个难得的中国崛起的机会，“大国崛起”与“和平崛起”的调和是中国面临的课题。